



边疆史地丛书

中国北部边疆史 研究

吕一燃 著



黑龙江教育出版社



边疆史地丛书

中国北部边疆史研究

吕一燃 著

黑龙江教育出版社

1998年·哈尔滨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中国北部边疆史研究/吕一燃著. —2版(修订版). —哈尔滨:黑龙江教育出版社,1998. 12
(边疆史地丛书)
ISBN 7-5316-1170-8

I. 中… II. 吕… III. 地方史-研究-中国-北方地区 IV. K29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1998)第 31004 号

边 疆 史 地 丛 书

中国北部边疆史研究

Zhongguo Beibu Bianjiangshi Yanjiu

吕一燃 著

责任编辑:王晓明

封面设计:陈冬妮 安玉滨

责任校对:李 树

黑龙江教育出版社出版(哈尔滨市南岗区花园街 158 号)

黑龙江新华印刷厂印刷·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开本 850×1168 毫米·1/32·印张 10·字数 220 千

1998 年 12 月修订版·1998 年 12 月第 2 次印刷

印数:1 201—2 600

ISBN 7 5316 1170 8 K·30 定价:18.00 元

《边疆史地丛书》序

中国是一个历史悠久的多民族国家,它是各兄弟民族共同缔造的。在漫长的历史发展中,随着历代王朝的兴衰更替,国境范围时有变迁。在近代,中国沦为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边境遭到了列强的蚕食鲸吞,边界线发生了频繁的变动。因此,中国历史上的边疆不是固定不变的。

从古代起,中国边疆地区与中原地区就有密切的联系,但它们之间又存在着不少差异。边疆地区在民族、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都明显地表现出自己的特点。这种差异和特点,规定了中国边疆史地可以作为单独的研究对象,可以成为一门独立的学科。

研究中国边疆史地,探索其发展变化真谛,总结历史经验教训,这不仅是本学科发展的需要,同时对于维护国家领土主权,处理中国与邻国的关系,加强国内各民族的团结,进行爱国主义教育等,都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边疆史地研究,涉及国家、领土、主权和民族关系等敏感问题,学术界一向把它视为禁区,很少有人问津,致使这门学科长期停滞不前。为了改变这种状况,我们在黑龙江教育出版社的大

力支持下,编辑出版了这套《边疆史地丛书》,希望能引起学术界的兴趣和共鸣,从而把边疆史地研究推向前进。

丛书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导,坚持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坚持严谨的科学态度,坚持“百家争鸣”的方针,并以本学科独特的方式,为巩固祖国的统一,加强各民族的团结,促进边疆建设,繁荣边疆文化,做出自己的贡献。

中国边疆包括陆疆和海疆,边疆史地学研究范围广泛,举凡边疆史地理论、中国历代疆域、边疆民族、治边政策、边疆开发、边疆文化、边疆外交、边疆政教、边疆海岛、边疆人物、边疆考古、边疆历史地理和近代边界变迁等,都在研究之列,其有关专著、资料和译稿,将陆续收入这套丛书之中。

中国边疆史地学是一门新兴的学科,因此,呈现在读者面前的这套丛书,一定有许多不足,甚至谬误,我们衷心地希望得到批评和指正。

中国社会科学院

中国边疆史地研究中心

1988年12月

自序

这本论文集,收入我近十年来撰写的关于新疆、蒙古、黑龙江等边疆地区的历史论文,内容包括历史上的疆域、边界、政治、经济、人物、对外关系和革命斗争等方面。因为探讨的多属北部边疆的历史问题,所以取名为《中国北部边疆史研究》。

1956年我毕业于北京大学历史系。毕业后分配到中国科学院历史研究第三所(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的前身)工作,当时我的兴趣在太平天国史方面。1959年我被借调到中国革命历史博物馆参加建馆工作,负责的也是太平天国和鸦片战争部分。1960年我回到近代史研究所,原想继续从事太平天国史研究,但事情出乎意料之外,我刚从博物馆回来,就开始参加整理中苏边界问题历史资料。起初,我只把它看做是临时的工作,根本没有想到,这件“临时工作”一搞就是好几年,并把我推上了研究中国边疆史地的道路。

光阴荏苒,匆匆30年。在这期间,由于各种原因,我的研究工作时断时续,归纳起来,主要做了四件事:一、整理中苏边界历史资料;二、参加余绳武主编的《沙俄侵华史》(四卷本)的编写;三、主持近代中国边界问题的研究;四、撰写数十篇历史论文。这

本论文集,就是其中的一部分。

中国边疆史地学是一片沃土,亟待有志者去开发和耕耘。根据我的体会,研究中国边疆史地,特别是研究其中的边界和疆域问题,除了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的指导外,最重要的,也是最起码的,就是要有求实求真的科学态度,而求实求真是以丰富的原始资料为基础的。没有充分的第一手资料,没有真凭实据,不管如何能言善辩,妙笔生花,都是难以得出正确的结论的。因此,勤奋搜集资料,发掘前人没有利用过的新材料,并对其进行认真细致的鉴别,就成了我从事学术研究的座右铭。我能够提出一些新看法,填补边疆史地研究中的某些空白点,也多得益于新资料的发掘和利用。在写作过程中,我为搜求前人未曾利用过的档案和稿本,确实花了许多心血,自信资料是比较翔实的。

研究中国边疆史地问题,不应在原地踏步,不应以重复别人说过的话和做过的结论为满足。撰写论文,应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有所前进,有所发现,有所提高,或提出新看法,或解决新问题,或开拓新领域,或提供新资料。一言以蔽之,总要有点儿新意,否则就没有什么意义。我经常以此要求自己,也努力这样去做,但究竟做得如何,这要由读者来鉴定。

从事中国边疆史地学研究,特别是对于古代疆域和未经条约划定的边界线的研究,是件十分艰苦的工作。边疆地区历史资料缺乏而零散,这为研究工作带来了很大的困难,所以要花很大的力气去寻觅,去搜求。有时为了弄清楚一个地名的位置,用了几天几夜时间,翻阅文献,查看古今地图,最终仍然一无所获。诸如此类的事,是经常有的。所以要有献身学术、不怕困难、埋头苦干和淡泊名利的精神,否则,很难坚持到底。

进行实地考察,是边疆史地学研究的一个重要方法,我们的

先辈曾经这样做过，是一个很好的传统。有些问题靠文献材料解决不了，一经实地调查，便能迎刃而解。限于条件，我在这一方面做得很不够，这不能不说是这本论文集的一个不足之处。

研究中国边疆史地问题，是件很有意义的工作，但到目前为止，这门学科仍然比较冷落，研究力量也比较薄弱，希望有更多的年轻史学工作者加入这支队伍，使这门学科繁荣起来。

收入这个集子的文章，约有一半曾分别发表在《历史研究》、《近代史研究》、《史学月刊》、《西北史地》和《新疆大学学报》，另一半则从未公开发表过。《辛亥革命在新疆》一文写得最早，1964年曾以《辛亥革命时期新疆各族人民的革命斗争》为题，提交全国近代史学术讨论会，后经修改，刊于《近代史研究》。除此之外，所有各篇，均写于80年代。《清末民初的禁烟运动和俄国在中国边境的鸦片贸易》脱稿最晚，完成于1989年春。

我在积累资料和撰写论文的过程中，曾得到近代史研究所余绳武、刘存宽、徐曰彪、陈春华诸同志的热情帮助。《中国边疆史地研究的几个问题》一文，是和马大正同志合作的。谨在此一并致以真挚的谢意。

最后，我想说明，写这些文章时，虽然尽了自己的努力，但限于水平，难免有不妥之处，衷心地期待着专家读者的批评指正。

1990年1月

于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边疆史地研究中心

目 录

发扬优良传统,开创边疆史地研究的新局面	(1)
中国边疆史地研究的几个问题	(10)
关于“帕米尔”地区的古今名称、范围和含义	(18)
驳柳条边“国界”说	(33)
清政府对阿勒坦诺尔乌梁海的管辖	(43)
阿勒坦诺尔乌梁海历任总管考略	(57)
阿勒坦诺尔乌梁海究竟属于何族	(60)
阿勒坦诺尔乌梁海图巴族人说质疑	(66)
噶尔丹“服毒自杀”说辨伪	(71)
浩罕与张格尔、玉素甫之乱	(76)
清代边疆名臣明谊	(91)
谢彬及其边疆史地著作	(107)
辛亥革命在新疆	(123)
辛亥伊犁起义的领导者冯特民	(149)
关于 1912 年“新伊犁城谈判”的几个问题	(162)
民国初年沙俄对阿尔泰地区的侵略	(182)
沙俄与 1911 年外蒙古“独立”	(199)

哲布尊丹巴政权的首任“总理大臣”是谁?	(221)
19 世纪末 20 世纪初沙俄对新疆地区的经济侵略	(231)
《俄商借道伊犁、塔城运茶出口章程》签订于何时	
——兼与王铁崖先生商榷	(244)
俄商茶叶走私与《俄商借道伊犁、塔城运茶出口章程》的	
签订和废弃	(249)
沙俄与漠河金矿	(262)
清朝末年璦琿阿林别拉沟煤矿的发现和开采	(283)
清末民初的禁烟运动与俄国在中国边境的鸦片	
贸易(1906 年~1917 年)	(288)

发扬优良传统，开创边疆史地研究的新局面

一、爱国主义和求实精神是中国边疆史地研究的优良传统

在清代，边疆史地作为专门研究对象，是从嘉庆、道光年间开始的。祁韵士和徐松就是当时研究边疆史地的名家。但边疆史地研究形成一种学术思潮，却是同鸦片战争之后的边疆危机相联系的。

中国边疆史地研究有个优良的传统，那就是爱国主义和求实精神。

鸦片战争之后，随着资本主义列强的入侵，清朝国势一落千丈，一些关心祖国命运的知识分子，鉴于边疆危机的日益加深，便潜心于边疆和域外的研究。他们本着求实求真的态度，旁征博引，认真考证，写出了一批很有学术价值的论著，如魏源的《海国图志》和《圣武记》，徐继畲的《瀛环志略》，张穆的《蒙古游牧记》，何秋涛的《朔方备乘》等，这些学者都是抱着忧国忧民的心情来从事研究和写作的。他们希望自己的著作对祖国的富强和边疆

的巩固有所裨益。

19世纪五六十年代,沙俄强迫中国签订了一系列边界条约,割占了黑龙江以北、乌苏里江以东和新疆边境的大片领土,朝野人士为之震动。随后,一批研究中俄边界问题的书籍先后问世,其中以钱恂的《中俄界约勘注》,邹代钧的《中俄界记》,王树楠的《新疆国界志》等最为著名。在这些著作中,作者根据确凿的历史事实,揭露了沙俄对中国的侵略,鞭挞了清朝官吏的昏庸卖国,充满着痛国土之沦丧的爱国之忧。书中对于边界线的走向,有关山脉河流的位置,也做了认真的研究。此外,还有一些著作是直接为外交斗争和边防建设服务的。如钱恂的《帕米尔私议》,海英的《勘分帕米尔图说》,曹廷杰的《西伯利东偏记要》和《东北边防辑要》等。

清朝末年,日本妄图侵占我国延吉(延边)地区,挑起所谓“间岛问题”。资产阶级民主主义革命家宋教仁激于爱国义愤,广泛搜集国内外有关资料,奋笔疾书,写出了《间岛问题》长文,揭诸报刊。爱国官员吴禄贞,带领随员,亲赴延吉调查并参阅大量资料,主持编写了内容翔实的《延吉边务报告》一书,及时地提供外交部门参考。宋、吴的论著,有力地驳斥了日本侵略者的谬说,维护了国家的领土主权。

民国年间,随着英、俄、日对西藏、蒙古和东北地区的扩张和侵占,我国出现了许多研究西藏问题、蒙古问题、东北问题的论著。这些论著,穷本探源,论证了西藏、蒙古、东北等地很早以来就是中国的一部分,驳斥了帝国主义为肢解中国领土而制造的“西藏独立”论和“满蒙非中国领土”论等谬论。

由于边疆危机是全面性的,所以民国期间研究问题的视野也由原来仅限于某一局部而扩大为整个边疆。因此,苏演存的

《中国境界变迁大势考》，谢彬的《中国丧地史》，白眉初的《国界小志》，葛绥成的《中国近代边疆沿革考》，顾颉刚、史念海的《中国疆域沿革史》，毕企云的《中国边疆问题》等全面研究中国边疆问题的著作，也纷纷问世。同时还出现了《禹贡》、《边事研究》、《中国边疆》等多种登载边疆史地研究成果的刊物。特别是顾颉刚先生创办的《禹贡》杂志，至今仍为学术界所称许。

鸦片战争以来，我国边疆史地著作的数量很大，它们的学术价值也很不一样，在一些至今尚为人们称道的著作中，几乎无例外地贯穿着强烈的爱国主义精神和实事求是的严谨学风。这是前辈留给我们的一份最珍贵的遗产，我们应该加以继承和发扬。

二、中国历代疆域史和中国近代边界史 是边疆史地研究的薄弱环节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我们在中国边疆史地研究方面，已取得了很大的成绩。边疆各省区社会科学院的历史研究所和民族研究所，许多大专院校的历史系以及其他研究单位，拥有不少从事边疆史地研究的人才，并出版了一批有较高学术水平的著作。例如谭其骧先生主编的《中国历史地图集》的历代边疆图幅，其规模之宏大，内容之翔实，是前所未有的。在边疆地方史志和边疆民族等方面，也有不少佳作问世。可以这样说，在边疆史地学的某些领域，我们的研究已经远远地超过了历史上的任何时期。

但是，毋庸讳言，中国边疆史地研究至今仍然存在着薄弱环节，这主要表现在历代疆域史和近代边界史研究方面。

中国是一个历史悠久的多民族国家,疆域的形成有个复杂的发展过程。中国幅员辽阔,有漫长的边界线,有十多个邻国,不仅有陆疆,还有海疆。鸦片战争后,列强对中国边境进行蚕食鲸吞,边界线发生了频繁的变动,并遗留下若干历史悬案。在边界线已经划定的地段,也存在一些争议地区,亟待研究的问题是很多的。由于疆域史和边界问题关系到国家领土主权问题,多少年来一直被学术界视为禁区,很少有人问津,至今仍然“门前冷落”,有关论著寥寥无几。这种情况,同我们一些邻国相比,差距是很明显的。

前苏联一贯重视中苏边界问题研究,在我们还没有意识到必须研究这个问题的时候,他们就已初步形成了一套为沙俄侵占中国领土辩护的说法了。60年代初,中苏关系恶化,前苏联为加强中苏边界研究,增设了一些研究机构。1966年在莫斯科建立了苏联科学院远东研究所,1970年在符拉迪沃斯托克(海参崴)建立了苏联科学院西伯利亚总院远东科学中心,着力于中苏边界史、中国边疆史、远东苏联地区史和满洲史的研究。远东研究所创办的《远东问题》杂志,经常发表歪曲中苏边界历史真相的文章。此外,前苏联科学院东方学研究所,哈萨克共和国瓦利哈诺夫历史考古和民族研究所,塔吉克共和国东方学研究所等,也都注意中苏边境问题的研究。1966年以来,前苏联报刊杂志发表中苏边界问题的文章在数百篇以上,出版专著、论文集、资料集的数量也相当可观。不仅用俄文出版,同时还用英文出版,竭力在国际上传播他们的观点。他们把黑龙江、乌苏里江流域说成是俄国“新土地发现者”开发的地区,把《尼布楚条约》说成是对俄国的不平等条约,把《璦琿条约》和《北京条约》说成是俄国收回部分失地的条约,否认清帝国西部边界在巴尔喀什湖,并把

帕米尔未定界说成是已定界,等等。

至于中印边界,从1958年就已成为国际学术界广泛关注的问题。印度和其他国家的学者先后撰写了许多论著。据澳大利亚朱丽·马歇尔夫人编辑的《1765年~1947年的英国与西藏——中印边界争端背景西文书目选释》一书所载,从1958年至1974年,用西文出版的中印边界问题论著就有一百多种,其中属于国际法范围的22种,印度学者著作占10种;属史地范围的80多种,印度学者占32种(论文10篇,专著22种)。在印度学者的著作中,虽然有卡鲁纳卡尔·古普塔那样以高度科学的态度、实事求是地探求中印边界历史真相的著作,但这是少数,大多数著作是为了配合印度政府坚持非法的麦克马洪线的无理要求,以及论证印度依据官方新绘地图的边界线向中国提出领土要求的无可非议。

关于中越疆界问题,越南早在1964年就出版了越南史学家陶维英的《越南历代疆域》一书,肯定了传说中“西抵西蜀,北至洞庭湖,南接占城”的文郎国的存在,说文郎国是传说时代越南的国名。该书对1887年清政府与法国划定中越边界进行评论,说法国把越南的一大块土地,白白地送给清国,以换取对法在越南侵略行为的承认。近几年来,越南有人公然提出,他们国家的领土“应溯源于百越时代”,把长江以南全部囊括在越南的历代疆域之内。对我国的西沙和南沙群岛,越南也提出领土要求。早在20世纪70年代,南越当局就发表了《关于黄沙群岛和长沙群岛的白皮书》,妄指中国的西沙群岛和南沙群岛为越南图籍中的黄沙和长沙。同时还派人到日本、美国、法国、英国和荷兰等地搜集资料,撰写文章,出版了《黄沙和长沙特考》(论文集),企图以此来“证明”西沙、南沙群岛“历来属于越南”。南北统一后,越南

政府继承南越当局的观点,声称西沙、南沙群岛“很久以来就是越南的领土”。近年来又公然出兵侵占我国南沙岛礁,不断制造军事冲突。

除了越南,马来西亚和菲律宾也对我国南沙群岛提出领土要求,并占领部分岛礁,开采石油和天然气。

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和韩国的历史学者,在边疆沿革史方面花了不少力气,发表了许多文章和著作。

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的学者特别注重古朝鲜疆域的研究,他们认为中国东北地区古代少数民族建立的扶余国和渤海国都是朝鲜的古代国家。建都于今辽宁桓仁县的高句丽是朝鲜政权。高句丽时期是朝鲜最强大的时期,它的统治范围曾达到河北北部和山西西部。

韩国学者对于朝鲜疆域的看法很值得注意,他们说“檀君和箕子朝鲜的领土是从东海和符拉迪沃斯托克(即海参崴),经黑龙江和兴安岭,直至中国的北京”。百济“统治了长江以南的越州”。新罗的领土曾扩张到“北平地区”。有些学者重新提出所谓“间岛归属”问题,发表许多论著,如《间岛小史》、《间岛归属问题》等,都不顾历史事实,鼓吹把“间岛”划归“韩国”。此外,韩国还有一些人叫嚣说:“整个白头山(即长白山)都是大韩民国的领土”,长白山天池水面一分为二是对朝鲜的侵略。

总之,我们的邻国对疆域、边界研究的重视程度远远超过我国,出版论著数量之多更非我们所能比拟。就科学性而论,国外出版的有关著作,比较尊重客观历史事实的固然有,但出于某种政治目的,充满民族偏见,故意歪曲疆域和边界历史真相的也很多。

从国内外的研究情况看来,组织人力,运用马克思主义观

点,加强疆域史和变迁史的研究,已是一项刻不容缓的任务了。

三、开创边疆史地研究的新局面

疆域和边界问题,在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著作中,受到了应有的重视。马克思和恩格斯曾多次批判国界问题上的“自然疆界”论、“民族原则”论等谬论。恩格斯指出,“自然疆界”论是兼并主义者的侵略理论,他们可以用这种理论不断地向邻国提出领土要求。对于“民族原则”论,恩格斯驳斥说:“欧洲没有一个国家不是一个政府管辖好几个不同的民族”,“没有一条国家分界线是与民族的自然分界线,即语言的分界线相吻合的”,“民族原则”是“俄国人为为了灭亡波兰所臆造出来的发明”。马克思、恩格斯在《社会主义民主同盟和国际工人协会》一文中,更进一步指出:“泛斯拉夫主义是圣彼得堡内阁的发明,它的目的无非是要把俄国的欧洲疆界向西面和南面推进。”马克思、恩格斯关于边界问题的论著,应该成为我们研究边界问题的指导理论。

我们知道,国界是随着国家的产生而产生的,它也将随着国家的消亡而消亡。但是在世界上还存在着国家的情况下,自然也就存在着国界。这一点,列宁在十月革命前夕就曾明确指出:“我们主张要有国家,而有国家就得有国界。自然,国家可以有资产阶级政府,而我们是需要苏维埃,但苏维埃也还是有国界问题,‘打倒国界’是什么意思呢?无政府状态就从这里开始。”

既然社会主义国家仍然要有国界,那么,研究国家边界问题就依然是一个不可忽视的重要课题。今天,我们研究中国历代疆域史和近代边界问题,总结历史经验教训,不仅是本学科发展的需要,同时对于维护国家领土主权,解决边界争端,处理中国和